

华夏风云丛书·殒星篇

燃尽的红烛

编者：秦晓鹰等



華夏出版社

华夏风云丛书·殒星篇

燃尽的红烛

编者 秦晓鹰等

华夏出版社

1987年·北京

DQ 05/13

《华夏风云》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问编审：温济泽

主 编：秦晓鹰

副主编：戴 晴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邱 建 铁竹伟 秦海波

秦晓鹰 黄济人 戴 晴

华夏风云丛书·殒星篇

燃 尽 的 红 烛

编者 秦晓鹰等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7.625印张 132千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册

ISBN7—80053—107—4/K·010

书号：11484·010 定价：1.30元

目 录

忆老舍	楼适夷(1)
迟到的怀念	章文晋(10)
湮没不彰的史实	陈子善(18)
流逝的岁月	王映霞(28)
师生恩重、战友情深	江 明(36)
但愿冬寒化早春	陈漱渝 武在平(50)
我的父亲——朱镜我	朱庭光(60)
一部文学巨著的消失	思 乡(84)
播火	梅 志(91)
“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	朱 正(102)
给予者	陈辛仁(122)
司马文森和他的散文	陈残云(136)
家信	雷维音(147)
怀傅雷	柯 灵(155)
燃尽的红烛	萧阳文(163)
佚诗二首	郁达夫(209)
赠勤工俭学同人(诗一首)	陈 毅(211)
飘零的黄叶	张闻天(217)
病榻琐记	秦邦宪(228)
狱中给父亲的信	何功伟(236)

忆老舍

楼适夷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礼堂里，怀着深深的哀痛和对“四人帮”的无限仇恨的心，我默默地望着老舍先生的遗像，翻滚起一幕又一幕绵长的回忆。

50多年前自己还几乎是孩子的时代，从《小说月报》最初读到先生用“舒庆春”的名字所发表的长篇。这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新文学创作中，第一次出现的新颖的长篇小说《赵子曰》、《老张的哲学》和《二马》等，辛辣地揭示了旧社会庸俗罪恶的面貌和以热情的笔塑造出正直、朴厚的劳动人物，最早打开了一个小读者幼稚心灵中渴望认识世界的欲望。但等我有机会得以亲近先生警歆，则已在10多年之后抗战初期，在武汉追随先生搞“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时候了。

全面抗战一打响，老舍先生毅然离开山东齐鲁大学教授的职务，抛别留在即将沦陷的济南的家人，独自带着一个小小的行包，流亡到当时成为抗敌中心的武汉，拿起他的永不停息的健笔，投入到抗日战争的行列。在一向的印象中，好似乎平时不大习惯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的先生，为着祖国，为着抗战，立刻

成了一个无私忘我、勇猛奋进的战士。为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摆设了盛大的宴席，可是进步的文人不愿做他们的御用工具，出席者寥寥可数。国民党无法把他们组织起来。那时我党驻武汉的代表周恩来同志认为应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组织包括各方面力量的文艺团体，但领导权决不能落在国民党手里。他向我们指示应当推荐老舍先生出来组织这个团体，并亲自和先生作了亲切的谈话。先生于是不辞艰苦，挺身而出，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担当起在文艺战线中团结各种派别的骨干力量。他毅然地宣言，“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的抗战，我就跟着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党和左翼的文艺队伍信得过先生，国民党反动派也没法给先生戴上什么大帽子，他便成为团结各种文艺力量的最适当的人选。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了。开大会，发宣言，办刊物，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号召作家到群众中去，到战地去，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活动。国民党口头上答应了承担经费，实际上看看达不到控制为御用工具的目的，尽管先生一次次跑腿坐索，结果还是一个钱也不发。协会付不出房租，发不出工作人员的生活津贴，要开会也租不起一个会场。但这并没有难倒名为协会总务部长而实际是主持人的老舍先生，他一面自己掏腰包，一面四处奔走，联络文艺界的朋友，凭私人面子去向冯玉祥、邵力子等抗战

中的闲员借款，而且还常借用他们阔气的公馆召开理事会。终于租下了会址，办起了《抗战文艺》三日刊。特别是为了这个刊物，我们做编辑工作的人，总是把最“难念的经”让老舍先生去“念”。我们当时不能不让国民党特务文人王平陵等也在刊物上写文章，但写来的稿子有时狗屁不通，而且暗暗地埋下了反共的毒刺，遇到这种场合，我们就让老舍先生出面去办交涉，不是退稿，便是要他删去不利于抗战团结的字句。老舍先生当仁不让，一一地完成了这种为难的任务。那时的情况，几乎可以这样说：没有老舍，这个协会必然什么事也干不成，变成一块空牌子，而老舍先生却把它真正地充实了起来。一切都以他为轴心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活动。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与这位文艺界的前辈很快建立了亲密的友谊。特别是我从医院里开刀出来，身子衰弱得没法工作，生活在到处打游击的日子里，老舍先生亲切地邀我和他同住在一起。在武昌的千户街和他相处的一个月的时间里，我能够更接近地体察到他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他的屋子里总是不断地接待着文艺界的一批又一批的来客，大家谈论着如何再接再厉地开展文艺抗战的活动。送走了客人，他立刻拿起笔来继续写作。只要为了抗战，他什么都写。各处报刊的约稿，他无不迅速应命。他写论文、杂感、通俗的说唱，甚至抗敌协会里的不署名的《会务报告》，也都是亲自一次一次地执笔。我在养

病中无事可为，便跟着学习写些唱词。南方人口音不同，我写出来常不合辙，他便给我一个字一个字的修改。他那时也大量地看青年文艺工作者的幼稚的习作，并且加以修改，常常为此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我们朝夕相处无话不谈。他早已看穿了蒋介石消极抗战的面目。他告诉我，冯玉祥到马当山一带去视察江防，站在炮艇上看两岸的炮位工事都历历可见，日本人一场空袭就可以扫荡干净，哪里有一点真抗战的样子。但他对抗日必胜还是乐观的，他相信人民的力量。我又听他谈在英国的生活，谈大学内幕勾心斗角的斗争，谈北京的社会生活、人情与风习，也听他谈过自己的出身和经历，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他的日常生活非常简朴，当时他个人的收入也只是些5元、10元的零星稿酬，吃的是大锅饭，穿的是从北方带来的几件旧衣服，总是“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从来未见他穿过当时很流行的西服。在国外生活过那么多年，但他身上却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洋气，倒象一位从乡下出来的学究。一次，有位熟朋友来，谈久了便提议：“好，上外头去走走。”于是便一起到武昌街头熟悉的小饭馆，叫上一壶酒，几样简单的下酒菜，吃一点小点心。可到最后还是由他掏出钱包来付钞，“不许同我争，到底我比你们还富一点呀。”

武汉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有些人已陆续撤离，我不能永远在武昌作食客，从先生那里借了几十元路费，便和朋友一起往南跑，妄想在广州还能

做些工作，不料广州比武汉沦陷得还早，只好跑到了香港。那时先生已转移到重庆，他来了信，说：“你到了香港，这也好，看看在香港能不能搞个抗敌协会的分会。”还给我介绍了当时在香港大学当教授的老作家许地山先生和马鉴先生。我去找了他们，由他们出场，很快地就组织起有许多留港作家和香港文艺工作者参加的分会，在这个不属祖国的祖国土地上，展开了公开的文艺抗战活动。我与许地山先生也成了朋友，谈到老舍先生刻苦的生活、勤劳的工作、平易近人和任劳任怨的精神，许先生便说：“老舍嘛，他是穷苦出身，从小在北京大杂院里长大，他一直保持勤劳人民的本色。”老舍先生自己 also 对我讲过，他父亲是一个满洲旗兵，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时候，是在巷战中阵亡在北长街一家粮食铺门口的。他从小生活在贫苦的劳动人民中，一直到后来他在作品中写出各种各样的社会层，其中凡是正直、忠厚的人物，往往都是饱经贫苦生活的劳动者。

在后来的战争流浪生活中，我和先生失掉了联系，在“孤岛”的上海，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已只能偶然听到有关先生的传闻。他在重庆仍以“抗敌协会”为中心，开展不屈不挠的活动。他所主持的《抗战文艺》刊物，成为大后方文艺抗战运动的重要阵地；他率领“作家前线慰问团”深入北方战地，还特别去访问了延安。当他回到重庆，为协会的事受到国民党种种的刁难，他提出抗议：“我扛的就只有这块招牌，

你重庆不让挂，我可以挂到延安去！^③

抗战胜利后，听说他和曹禺同志一起应聘去美国讲学，以后好久没有消息。我流亡到了香港。1948年解放战争接近全面胜利时，不知从哪里得到了先生的通讯处，我写信去报告自己近10年的行踪，很快接到他的来信，告之他在美国的生活与心情。他遥望着祖国伟大解放战争的漫天的烽火，谛听着一个又一个的悦耳的胜利的捷报，身在异国，远离战斗，越来越觉得国外生活的苦恼，“每天吃饭都象吃药一样无味，急想回国”。我接到这封信马上报告了组织，组织立刻决定请他回来。终于他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建国不久后的自己的故乡——祖国的首都北京。当我去迎接他时，他把一本我托他购买的《罗丹雕塑图册》，亲笔题词作为礼物送给了我。遗憾的是这珍藏20年的宝贵的礼物，在文化大革命中失掉了，但失不掉的，却是永留心中的厚谊。

在北京的10多年中，为了工作关系，与先生有很多接触的机会，一起开会，散了会总是一起出来随便闲谈，走了一段路，他又提议了，“已经快吃饭的时候了，一起上哪儿喝一杯吧”，又象在武昌的时候一样，在什么小饭馆里坐下来继续聊天。到他家里去联系工作，谈完了事，便领我在他院子里去看他亲手培养的满园的菊花。出版社约请他写稿，他每次都爽快答应，迅速完成。从来没见过他做过翻译工作，为了组织肖伯纳的剧选译本，想到如果能用老舍先生

的笔，来译一部肖伯纳的作品，一定会珠连璧舍，比谁都更能体现出肖的风格。我向他去提议，怀疑他恐怕不会答应，不料他一口就同意了，很快译出了一部肖的《苹果车》。我的见闻不广，这可能是他出版过的唯一译作了。他对于向他提出的要求，几乎都是求必应的。在20年代一辈的老作家中，他是解放后执笔最勤的一位。他热情歌颂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歌颂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甚至市政的设施，街道的服务活动，一切新人新事，劳动模范，战斗英雄，无不出现在他的笔底。10多年中他连续写出了十几个剧本，从没有休过自己的笔。而且他又那么谦虚，写出作品来总是多方听取别人的意见，毫不厌烦地一次次修改和易稿，有一个剧本改过11次之多。一直到戏剧上台，剧本出版受到大家的赞扬，自己还总是觉得不足。一部写大骗子李万铭的剧本，他题名叫《西望长安》，问他为什么题这样的名，他摇摇头说：“西望长安不见家（佳）嘛！”

他还付出宝贵的时间替别人看稿和改稿。有一次上他家去，问他近来写些什么？他说：“什么也没写，正在当‘奴才’呀，替我们‘皇帝’润色稿子呢！”这就是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是党交给他的任务，他什么都干。

在有求必应中，出版社求不到他的事只有一件。1957年后出版社组织重要作家的多卷文集，计划中列入了先生的名字，经过长时间多次的要求，他就是

不肯允诺：“我那些旧东西，连我自己都不想看，还叫别人看什么呢。出了一部《骆驼祥子》就算了吧，我还是今后多写一些新的。”

他年事已高，走路需要拄一条拐棍，可是他下农村，跑工厂，上战地，为了写新的作品，总是不断地去熟悉生活，深入群众，从不回避艰苦。

这样一位热爱党，热爱人民与社会主义祖国的前辈作家，竟然在林彪、“四人帮”的残暴迫害下，悲惨地死去。在“牛棚”里听到了这个震人的噩耗，在衷心哀悼中，我开始隐约地看见正有一条法西斯式的反革命黑线，在疯狂地干挠和破坏党的革命路线。老舍先生正是在作家队伍中受这条反革命黑线的迫害最早壮烈牺牲的一位。不久，有外调的人来找我我要我揭发老舍的“罪行”。我说：“老舍我倒是熟悉的，可以提供一些自己所知道的情况。”我受命用书面写出来，来人一看就瞪起了眼睛：“你为什么现在还要美化他？”我说：“我这写的都是我已知的事实，什么化也没有化过呀。”他气得把桌子一拍，站起来就走，对另外一个人说：“黑帮嘛，就是包庇黑帮。”

现在才知道，按照林彪、“四人帮”的“法制”，因为是“黑帮”，在遗体火化后，是连骨灰也不让家属领取的。老舍先生的骨灰匣里，只是空空地放着他生前片刻不离的一副眼镜和一支笔。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的仪式中，我默默听着北京市领导人主持仪式的宣告，和茅盾先生所做的声调低沉的《悼词》，望

着站在行列前沿参加仪式的中央领导同志，和台上的那只空空的骨灰匣。“它哪里是空的呢？它比什么都充实，它比什么都饱满，这匣中装满了千百万先生的读者对先生的爱，装满了党和人民对先生一生劳作所表示的尊敬和感谢！”在密密层层静默的行列中，我心里这样想着：“敬爱的老舍先生，静静地安息吧，你和我们大家都胜利了！”

迟到的怀念

章文晋

我开始听说成仿吾同志的名字，是1927年去德国留学前。那时候，他早已因和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一起创办《创造》杂志，组织创造社而蜚声文坛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成仿吾来到了法国，在巴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负责编辑中共旅欧支部机关刊物《赤光》。我到德国后，在要好的朋友、共产党员张罅处，常翻看从法国寄来的《赤光》杂志，发现上面常有署名石厚生的文章。张罅是著名民主人士张澜的儿子，酷爱文学。他告诉我，石厚生就是文学理论家成仿吾的化名。这些文章更增加了我对成仿吾的仰慕。

1928年秋，成仿吾同志转到德国留学。当时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德国共产党力量强大，理论研究和实际运动都处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成仿吾同志早年在日本就攻读过德文，听和读都没有困难。他来德国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革命理论和西欧革命实践。

当时我们在柏林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住市中心和东区，这两地相距很近，为的是更靠近德共中

央总部所在地，便于同德共领导接近并参加党和工人的公开活动。成仿吾在我们同志间年龄最长，学识渊博，水平很高。他从不以领导自居，但实际上是我们大家的领导核心。为此，我们特意为他租了一间较大的房子，为的是能时常到他那里聚会、碰头，正式会议也多在他那里开。

1928年至1931年间，与成仿吾同志一起在柏林参加党团活动的有10多个同志，其中主要的有廖承志（1929年调去汉堡从事海员工作）、张罅、谢唯进、胡兰畦、沈则沉等。

当时要取得在德国留居权，必须在大学注册。我们就都在柏林洪堡大学注册，也上一些课。洪堡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颇有名气的大学，有开放办学的自由传统，学生除非要攻读学位，不必参加考试，听课也完全自由。我们在学校选修一些课程，主要是自己攻读马列主义著作和阅读中外革命书刊；也参加德国党主办的工人夜校；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包括上街游行，出席各种政治集会和文艺性集会。我们有自己的党团组织，经常在一起过组织生活，做些具体工作，为将来回国参加革命斗争作准备。成仿吾同志在我们中间身体力行，帮助大家学习，将同志们很好地组织起来。

成仿吾同志对革命理论的研究是非常认真的。早在日本读书期间，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已有颇高造诣，回国后也读过不少马恩著作的译本。他认

为既然把马列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南，那就必须真正准确地理解他们的著作，要尽可能地读原著。他的日、法、德文根底好，在德国期间可以对照着仔细研读马恩著作。他也努力钻研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尽管不懂俄文，但德国大量翻译了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译文也比中文更接近原意好懂，他感到很有帮助。在德国他写了大量的时事评论和介绍理论的文章，或登在《赤光》杂志上或送寄国内。可惜现在难于查找到。当时时间不允许他集中精力对马列著作进行系统的校译和著述。直到1979年他调中央党校任顾问以后，才实现了这个心愿。70年代，成仿吾同志在古稀之年，带领几位青年同志又重译了《共产党宣言》，校译了《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

1977年，我从国外回来去看成仿吾同志。见面没说几句，他就拿出《共产党宣言》的新译本说：“小章，这本新译本一共有48处改动。”他飞扬的神采，欢欣的情绪以及对我的称呼，一切都象50年前一样焕发着勃勃生气。

20年代中期，德国克服了战后初期的政治经济危机，有过一段相对稳定时期。德国战后通过的《魏玛宪法》表面承认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和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德国右翼势力并不死心并正重新抬头。执政的社会民主党领导是投靠垄断财团而登台的，

一贯欺骗、压制工人阶级，声望日堕，最后倒台。德国政权转到右派政党手中，最终导致希特勒的上台，实现了赤裸裸的法西斯统治。

1929—1931年初正是德国左右两翼政治力量激烈搏斗的时期，在德国人民爱戴的德共领袖台尔曼的领导下，德国共产党在斗争中表现得十分英勇顽强，一度成为大柏林市得选票最多的一个党，在全国是第四大党。

德国共产党掌握有很好的宣传教育工具。不仅出版书刊和富有影响的《红旗日报》，还办有五种杂志，团结了一大批左翼和中间的知名的文艺界人士。在日常深入群众的宣传鼓动和组织活动中非常活跃。共产党办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夜校，除了开办马列经典著作、共产主义经济政治理论课程，也办有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商业、实用工艺美术各种课程。应聘教师都是知名人士，对培养教育工人群众起了极大作用。

共产党和进步组织的集会也很多。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八”妇女节、苏联“十月革命节”，举办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节”纪念会或庆祝会；纪念马克思、列宁和德国革命先烈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还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组织“红色退伍军人联盟誓师大会”、“全国共青团全国大会师”、“国际儿童集会节”以及支援工人罢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反动势力杀害工人的事件等种种活动，